



国家图书馆文津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明代藩府刻书研究

陈清慧◎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明代藩府刻书研究

陈清慧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藩府刻书研究 / 陈清慧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013-5139-8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刻书—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1069 号

书名 明代藩府刻书研究

著者 陈清慧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13-5139-8

定价 80.00元

序

历史上出现并形成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现象,其背后都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动因。明代藩府刻书之所以成为明代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空前绝后的特殊社会现象,亦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藩王政策的动因。

明王朝的确立,是朱元璋及其谋臣武将共同征讨的结果。朱元璋称帝后,对那些有功之臣不能不加封晋爵,以示奖赏。然受赐诸臣,特别是那些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很快形成军中贵族,势力逐渐膨胀,又威胁朱氏皇权的稳固。为此,朱元璋到历史上封藩建屏的武库里寻求答案,并宴请群臣曰:“天下之大,必建屏藩,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道……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要之,为长久计,莫过于此。”(明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十)其实朱元璋讲的这些皆是官话,内心则认为“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服而捍外患”(《明史稿》列传第三)。骨肉之亲“较诸将帅,尤可信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一面冠冕堂皇,一面挟私建藩,梦想以“家天下”的形式实现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分封建藩用心,当时即有人看出了它的弊病:“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屏藩,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城郭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或则恃险争衡,或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不及也……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清乾隆《御选明臣奏议》卷一 叶伯巨《应求直言诏上书》)叶伯巨的直言切谏,不但未能动摇朱元璋的封王建藩决心,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并促使朱元璋告诫诸臣曰“后世有言更祖训者,以奸臣论”(《明史·太祖本纪》)。朱元璋杀鸡儆猴,内心亦知叶伯巨所说不无道理,所以对封王诸子又各派高僧大德日随左右,劝善诫杀,泯其谋反之心;诸王之国,又多赐经史典籍及诗文佳作,鼓励他们精研六艺诸史,潜心诗文,陶冶情操,无心问政。朱元璋驾崩后,诸藩势力已威胁中朝,故至建文时便开始削藩,为燕王朱棣提供了起兵靖难的借口。待朱棣称帝后,则严控宗藩,“不许擅役一军一民”(《明太宗实录》卷十八)。其后更逐渐形成一整套限制诸藩的政策:不许掌兵;不许出仕;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随意出城;藩王间不许随意相见;不许同时朝觐;不许从事四民之业。而竭力提倡者,就是让他们读经诵史,修德习文。将藩王限制在狭小的活动天地,只留一条出路,那就是潜心文事,莫问政治。明代藩府刻书成为一种风气,形成较

大影响,便是明代这种特殊藩王政策之下的特殊产物。陈清慧同志《明代藩府刻书研究》就是在深刻剖析上述这些政治动因基础上展开论述并纂辑而成的专著。

关于明代的藩府刻书,从内地到台湾,有不少人写过专论、专章,从各个角度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但全面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尚付阙如,陈清慧同志以五年不懈的努力撰写而成的这部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陈书最大的特点,是资料占有丰富。博采古今,旁搜中外,而后加以条理、归纳、分析、剪裁,运用到各相关的论述中,史论结合,言之有物。阐述有综合,有个案,纵分时段,横分地区,使人能清晰地感到,明代刻书最兴盛的时期,也是诸藩刻书最集中的时段;封地所居中原、江浙、湖广、川蜀、晋南的藩府刻书,较之辽沈、雁北、甘肃诸藩所刻之书,要量大质高,这是以前未曾探讨过的角度。读来酣畅淋漓,令人感服。

搜采明代藩府刻书,而后成文、成章、成目者,当推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今人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以及台湾吕彼得先生的大作。清慧同志因供职于国家图书馆有年,并从事古籍编目整理工作,有实践经验,她所搜集到的明代藩府刻书数量,要比前谓三人所列多出一百多种,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书稿付之剞劂氏之前,清慧同志问序于我。我和她既是同事,又是师生,无由推卸。我寄厚望于她,故有上述文字。既是鼓励,更希望她在做好日常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至嘱。

李致忠

2011年11月8日立冬于北京

绪 论

一、研究对象

本书将“明代藩府刻书”作为研究对象,简言之,就是要考察有明一代诸家藩府的刻书活动,并对藩府刻书进行整体呈现和个案分析,从而总结出明代藩府刻书的基本规律,揭示明代藩府的文化功用和藩府本的版本学价值。本文既然要考察“明代藩府刻书”,则必须要对两个概念进行界定。

(一)明代藩府

明史研究中的“藩府”、“宗藩”等概念,其含义有三个层面:一指皇室支系,一指功臣贵戚,一指周边属国。本文之所谓藩府,是指除皇太子而外,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宗室亲属及其后代支属,通常称为“某藩”或“某府”,而文中所涉及的所谓藩封制度、封藩建制及藩府活动,并不包括与功臣贵戚以及周边属国之间的关系。再,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万历以后,各藩之间的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很多宗室成员处境凄凉,以至于衣食难继、生活无着。但本文所考察的立足点既为“刻书”这样的文化活动,结合实际情况而言,乐于从事此类活动并且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产生过一定文化影响的藩府,大抵具有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拥有丰厚的财力、必要的人员、资源支持以及自身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这是藩府刻书活动必备的物质条件,而这些往往不是衣难自给、食难自足的藩府贫宗所能承担得起的,而明代有刻书可考的藩府,事实上亦均非贫宗,故本文所论“明代藩府”,除特殊说明外,贫宗困支亦未列其中。

自洪武初年朱元璋分封诸王始,分封子弟到全国各地为王即被明朝诸帝奉为不变之祖制。纵观有明一朝,藩封制度和藩王活动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整个朱明王朝相始终。明王朝的稳定、巩固、发展、兴盛和衰落都与藩封制度和藩府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前途和命运也同各地藩府密不可分。对明代藩府的总体考察是本文研究藩府刻书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本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总结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将藩王刻书活动及成果置于明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以相关史实为立足点,以藩王们的刻书活动为主要线索,从出版史和文献学的角度对明代藩府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明代藩府刻书进行系统、立体、深入的全面研究。

(二)藩府刻书

终明一代,分封到各地的皇室成员的刻书活动持续不断。此类活动同朱明王朝相始终,发端于洪武初年,成化、弘治时期蔚然成风,以嘉靖、万历时为最盛,而至

崇禎末年仍余勢未消。明代藩府所刻印之書,世多稱明藩本、藩府本或藩邸本。本文在論述和行文中,用“藩府刻書”一詞泛指明代諸家藩府的刻書活動,而對於明代藩府所刻印之書籍,則採用“藩府本”一詞涵蓋。現將本文的研究對象與論述範圍界定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就总的研究目的来说,本文既要从藩府角度研究明代刻书,又要从刻书活动的角度来研究明代藩府,这是“明代藩府刻书研究”一题的总纲和主旨所在。

第二,就版刻主体来说,藩府本是一个整体概念,泛指有明一代各藩府亲王、郡王以及其他皇室支属所雕刻、监刻或主持刻印的书籍。

第三,就版刻类型来说,藩府本是一个广义概念,以刻本为主,含活字印本、拓本及抄本。

第四,就版刻时间来说,严格限定在有明一朝(1368—1644)。之前或有旧版流传而明藩重印,入清而后明室后裔零星刻印之書,或仍有以藩府版修补重印及别有据藩府本翻刻者,均不在研究之列。

二、研究现状

(一) 相关领域研究

学术界关于明代藩府的研究由来已久,对明代藩封制度,藩王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以及明代藩王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彼此关系、相互影响等等方面关注颇多,研究所涉及的层面也较广,对明代藩府作了普遍性的多视角研究。这些成果绝大多数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侧重于某一方面的某个具体问题。

1. 明代藩封制度的整体性研究

(1) 明代藩封制度的建立。顾诚^①、张显清^②和余兴安^③认为朱元璋意识到了汉晋两代过于宽纵的分封制度导致诸王权力过大,而唐宋两朝在这方面又过于抑制,都是皇室势孤、强枝弱干之势的重要原因,故而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明代的藩封制度实际上是朱元璋辩证地吸取历史经验的结果。而张德信^④与周积明^⑤则认为明代藩封制度的建立是朱元璋削夺开国功臣军政大权的必要手段,是明初政治形势使然,是朱明王朝巩固皇权稳固统治的迫切需要。暴鸿昌^⑥又列举了藩禁政策的各种具体表现,马瑞《明代的藩封制度》^⑦对具体的藩封制度作了一些考察,都侧重于政策性探究,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指出了明代藩封制度的历史功用和弊

① 顾诚《明代的宗室》,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张显清《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③ 余兴安《论朱元璋的政治蓝图及其对明朝政治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④ 张德信《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⑤ 周积明《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⑥ 暴鸿昌《明代藩禁简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4期。

⑦ 《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端。另外,暴鸿昌^①、张显清^②、赵毅^③、赵中男^④等人都深入分析了明朝藩禁政策的演变情况和原因,认为洪武时期诸王政治、军事权力过于强大,而在靖难之后,永乐、宣德两朝推行更加严苛的藩禁政策,宗藩因此逐渐退出政治和军事舞台。

(2)明代藩封制度的影响。周积明^⑤认为藩封制度是朱元璋铲除开国功臣集团、抑制军功贵族势力、加强皇权集中制的手段,朱元璋借此将军事权力的重心从开国功臣转移到了宗室藩王。张显清^⑥和勾利军、汪润元^⑦等人则对明初诸藩在捍卫边塞、稳定朱明建国之初的封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也指出了永乐以后,由于受到藩禁政策的严苛限制,成为徒有虚名、坐拥厚禄而无所用心的寄生阶层,极大地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激化了阶级矛盾,是明王朝迅速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德荣^⑧认为明代的藩封制度的变化和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政治方面,朱元璋分封逾制,而各藩王亦自尊国擅兵,最终的结果是燕王之变;建文、永乐之后,对诸藩府的裁削和压制又过于严苛,矫枉过正,使诸王由权力的峰巅跌入了深渊。经济方面,不但执行朱元璋制定的岁禄祖制,而且私恩也越开越大,宗藩岁禄猛增,以致中央财政几近崩溃,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陈新权^⑨认为皇权与藩权的矛盾根源在于朱元璋开创的分封制度,将“靖难之役”的爆发归因于藩封制。孙大江^⑩和梁尔铭^⑪分别从藩封制度的具体内容、分封特点等方面分析了明代藩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及其演变,并较为深入地剖析了藩封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李国华^⑫则重点在于探讨明代宗藩制度的社会学层面的意义,认为“明统治者制定及推行的封王建藩之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层建筑领域内陈腐落后的制度之一,明代宗藩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最反动腐朽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一大阻力。它们被明末农民大起义摧毁,与朱明王朝同归于尽,是历史的必然”。张德信^⑬也由宗藩制度入手对地方宗藩对明代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

明藩在明代经济方面的影响是研究明代藩府较早的视角之一。其中,王毓铨、

① 暴鸿昌《明代宗藩特权的演变》,《北方论丛》,1984年第5期。

② 张显清《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③ 赵毅《明代宗室政策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④ 赵中男《明宣宗的削藩活动及其社会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

⑤ 周积明《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⑥ 张显清《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⑦ 勾利军、汪润元《明初分封藩王的原因与历史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⑧ 苏德荣《明代分封制度的演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⑨ 陈新权《朱元璋分封藩王与“靖难”之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⑩ 孙大江《明代的宗藩制度》,《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⑪ 梁尔铭《明代宗室分封制述论》,《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⑫ 李国华《明代的宗藩》,《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⑬ 张德信《明代诸王与明代社会政治》,《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李槐、李三谋、黄冕堂等人对于王府庄田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王毓铨^①对王府庄田的类别、性质、历史渊源以及土地来源、管理方式和田庄役民作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李槐^②以宗藩数量、赐田数量和万历清丈前后庄田的变化等为依据,揭示了王府庄田的主要来源。李三谋^③则对王府庄田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王府庄田的性质。认为从较长时期来看,明代王府庄田属领主经济,而短时间内则偶尔表现为地主经济性质。黄冕堂^④则详尽阐述了王府庄田的来源、性质及其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赵毅、覃延欢则将目光投向藩王们的经商活动。赵毅^⑤对明代中后叶的经济思想的改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重农抑商、贵农贱商”的现象有所转变,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强化了宗藩的贪欲,宗藩的经商活动因此蔚然成风,而宗室的商业活动近似于野蛮掠夺,不仅直接分割了中央朝廷的工商课税,而且对于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流也有着不可避免的限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覃延欢^⑥则初步探索了明代藩王参与商业活动的原因、特点和对明代社会的影响,并概括出藩王经商的一般特点。认为宗藩经商通常自己不出面,所依仗的是宗室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力,权钱交易的性质突出,所经营的都是有利可图的行业,其经营收入却并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大多是用来满足自身的贪欲和淫乐的生活,因此藩王经商活动虽然对改变明代“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有一定作用,但以藩王之特殊身份从事此类活动,更大程度上带有以权经商的性质,事实上也垄断了物价,控制了市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对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了严重影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赵全鹏^⑦则认为除了占有与掠夺土地之外,明代宗藩还侵占和盗卖屯田、侵掠市镇、蠹坏盐法等,这些都对明代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 对于明代藩封制度的专题性研究

(1) 宗藩犯罪。这方面的研究以雷炳炎为代表。雷炳炎的系列论文^⑧对宗室犯罪进行了深入的系统性研究,认为“亲亲”思想是明代宗室犯罪的根源。朝廷对犯罪宗室的处置,通常是发落高墙,安置闲宅,伴守祖坟与留住本府等,既要遏制宗

① 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

② 李槐《明代王府庄田的来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③ 李三谋《明初庄田经济的性质》,《晋阳学刊》,1988年第4期。

④ 黄冕堂《论明代贵族庄田的土地问题》、《论明代贵族庄田的主佃关系和封建剥削》,均载《明史管见》,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

⑤ 赵毅《明代宗室的商业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⑥ 覃延欢《明代藩王经商刍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⑦ 赵全鹏《明代宗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⑧ 雷炳炎《关于明代中期宗室犯罪问题的思考》,《求索》,2004年第10期;雷炳炎《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管理问题初探》,《船山学刊》,2003年第1期;雷炳炎《明代中期罪宗庶人归类论析》,《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雷炳炎《谈谈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的安置问题》,《湖湘论坛》,2003年第1期。

室的继续犯罪和危害社会,又要体现对宗室的“亲亲之道”。通过对明代中期宗室犯罪现象的分层次分类型的剖析,认为由于经济窘困,并且受到亲王、郡王以及官府的压力,下层宗室犯罪比例较大;而西北宗藩犯罪现象高于其他地区,则是由于俸禄稀少,生活艰难,并且西北地区生活环境较差的缘故。周致元^①则通过分析具体政策,对明代宗室犯罪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明代过于宽松的宗室政策和不以律令为基准的罪宗惩处,是宗室犯罪现象普遍的最直接原因。

(2)宗藩的人口和婚姻。明代的宗室人口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明代藩府研究的热点之一。王守稼^②认为朱元璋对宗室子孙采取岁禄包供的政策,鼓励了宗室生育,刺激了宗室人口的繁衍,从而保障了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认为朱元璋的宗室政策是明代宗室各种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张德信^③将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归因于藩禁政策,认为严厉苛刻的藩禁政策堵塞了宗室可能的谋生渠道,只能靠领取朝廷岁禄为生,而既然岁禄是按人头支取的,那么宗室为了领取更多禄米,自然广纳妻妾,多生子女,由此造成了宗室人口的急剧膨胀。智夫成^④认为朝廷极为优厚的宗室待遇诱发了宗室人口的剧增,另一方面,急速膨胀的宗室人口,也加大了朝廷财政负担,并引起了宗室上下层的贫富分化,朝廷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对最下层平民的剥削,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而魏连科^⑤则从婚姻制度的角度对明代宗室作了一番探究。指出洪武到宣德时期,朝廷对宗室婚嫁在于利用,试图通过宗室婚嫁,联姻文武勋贵,起到屏藩帝室、巩固皇权的作用。正统以后则在于限制,严格规定宗室婚姻的对象,禁止宗室与文武勋臣们联姻,以防止宗室通过婚姻形成威胁皇权的势力,试图控制和削弱宗室的力量。

(3)明代藩王个案研究。此类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靖江王、朱载堉和朱有燬等少数几个藩王身上。由于自身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靖江王的分封、待遇、地位及其他问题引起了较多的关注。主要文章有张子模和邹长清的《明代靖江王社会地位考》^⑥、覃树冠的《略谈靖江藩王与桂林文化》^⑦、薛向阳的《明初靖江王封藩的特殊性》^⑧、漆招进的《明靖江王的爵级》^⑨等。关于朱载堉和朱有燬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多,主要有邓宏礼等人的《朱载堉在沁阳的史迹》^⑩、王兴亚的《朱载堉生

① 周致元《明代的宗室犯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② 王守稼《试论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③ 张德信《明代宗室人口俸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东岳论丛》,1988年第1期。

④ 智夫成《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

⑤ 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姻制度述略》,《文史》,1990年第32期。

⑥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⑦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⑧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⑨ 《社会科学家》,2000年2期。

⑩ 《焦作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平事略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论〈郑端清世子赐葬神道碑〉的史料价值》^①、陈捷的《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②等。另外,任义玲的《明代南阳的唐藩及相关问题》^③、张健民的《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④、徐晶的《明代河南宗藩浅述》^⑤、傅山泉的《两世明藩潞王的生活环境及思想差异》^⑥、张民服和徐红的《明代开封周王的相关问题》^⑦、陈勇的《明代兗州鲁王和王府》^⑧等则从地域角度入手,对明代藩王作了较为详实的论析和评述。

(二)本课题领域研究

近年来,随着出版史和版本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对于明代藩府的研究逐渐有了新的视角,从文化活动入手研究明代藩府的文章渐多渐成熟。苏德荣的《明代宗室文化及其社会影响》^⑨从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主要成就、特点和影响四个方面探讨了藩王们的文化活动,指出优越的物质条件与闲在的生活环境为藩王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提供了条件,朝廷的提倡和鼓励使某些不甘湮没无闻的宗室成员得以优游文史,或潜心音律,或精研经义,或耽于法书,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都樾的《明代宗室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⑩也论述了明代宗室文化的产生背景、主要成就、特点及其影响,总结了明代宗室文化兴盛的三大背景:明代宗室政策、宗室教育使得宗室高素质人才大量出现、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盛和发展都为宗室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发展空间。该文还总结了明代宗室文化的主要成就以及府系性、阶段性、广域性三大特点,并进一步总结了宗室文化的社会影响:首先,明代宗室在诸多文化领域都开创了新的阶段,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其次,在明代文化的某些领域,宗室文化成就则代表着这一领域的发展高峰。第三,作为上层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宗室文化一定程度上领导着当时的文化潮流。

有关藩府刻书的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台北昌彼得先生的《明藩刻书考》^⑪是较早的专门研究藩府刻书的文章,其考论较为详尽,对于明藩刻书的时代背景、特点、基本情况及影响均有所涉及。曹之先生的《明代藩府刻书

① 《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② 《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

③ 《中州今古》,2001年第4期。

④ 《江汉论坛》,2002年第10期。

⑤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⑥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⑦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⑧ 《中州今古》,2003年第1期。

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⑩ 《学术论坛》,1997年第3期。

⑪ 《版本目录学论丛(一)》,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页39。

考》^①则从财力之富、藏书之多、人才之盛、韬晦之计四个方面分析了明代藩王刻书的背景和原因,并简要罗列了各藩刻书数量。余述淳《明代藩王的著书与刻书》^②认为明代宗室教育受到历届帝王重视,加上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待遇使得藩王们财力物力极为雄厚,而政治上却受到各种限制而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机会和可能性,因此许多宗室沉溺于著述、刻书等文化活动,这是明代藩府刻书活动兴盛、刻书成就斐然的重要因素。郭孟良《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③认为,明代许多藩府的刻书、藏书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各个藩府的图书活动还具有鲜明的系统性。明代宗藩相当发达的图书事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蔷《明代晋藩刻书研究》^④一文列举了明代晋藩雕刻书籍的史实,论析其刻书的动因和所刊书籍之特色,认为“晋藩因其财力雄厚,晋王多通文博雅,所刻书质量好、部头大,成就居明代诸藩之冠”,并对部分晋藩刻本作版本学意义上的考订工作。徐庄《明代的庆藩刻书》^⑤对明代宁夏庆藩的刻书数量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概括描述了庆藩刻书的基本面貌。另外,诸多出版史、版本学史、藏书史和印刷史的研究专著论及“明代”一节,大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藩府刻书的探究。其最具代表性者,当属李师致忠先生所著《古代版印通论》^⑥、《历代刻书考述》^⑦,张秀民先生所著《中国印刷史》^⑧、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⑨,对于藩府刻书,均设有专门章节进行探讨。而张氏用力尤勤,其“藩府本”一节除分析藩府刻书的社会背景、主要特点及影响而外,还在吸取多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列藩府本书目430余种,颇见功力。所憾者仅开列书单,却不注资料出处来源,故难知其所据,且论述时仍失之过简,语焉不详,读之仅得其要而已。

(三)小结

综上所述,对于明代藩府的研究,论者之目光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对于明代藩王的刻书活动涉及并不多。既有之,亦多以勾勒式的白描手法述其大概,或语焉不详,或浅议辄止,绝少更深层次的切入,研究工作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一步深入。究其原因有四:

其一,前人对于明代版本不够重视。在目录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明本并没有像宋元本那样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而历代藏书家所关注的重点也大都在宋元

① 《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2期。

② 《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④ 《图书与情报》,1999年第3期。

⑤ 《中国出版》,1994年。

⑥ 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⑦ 巴蜀书社,1990年。

⑧ 插图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⑨ 宁波出版社,2001年。

旧本,而对明本相对忽略,因此长期以来,明代版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可。特别是明清时的目录学家和版本研究者,所谓“明人不知刻书”,“明人刻书而古书亡”,对于明代版刻多持批判态度,大都不太看重明本,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人对明代版刻的看法,连类而及,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明代藩府本的受关注程度。

其二,相关的文献资料较少。由于明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藩府本流传亦罕,收藏较少,著录也相对简略,因此流传下来的实物和研究资料也就相对较少,这是相关研究难以细致深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明代出版史和明代版本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作为明代版刻别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藩府刻书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其三,当前研究对于现有文献资料的挖掘还不够细致。一方面是流传下来的实物和研究资料较少,另一方面,这些资料无疑是明代藩府本流传过程中的蛛丝马迹,是研究藩府刻书的重要依据。但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仍然有许多东西为研究者所忽略。仅就藩府本数量而言,笔者通过翻阅明清各家官私书目,即检出研究者所未及者一百余种。因此,相关的文献资料仍然有待进一步细致发掘。

其四,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思路不够开阔,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利用,因此还有重新审视加以利用的必要。例如关于明代藩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也有将之用来考察藩府刻书的,然而仍然不够细致,也不够深入。同样,对于出版史和版本学的研究成果利用得也不够充分,例如,学界关于《抱朴子》之版本源流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却极少有人将明代吉藩本《抱朴子外篇》放在这一源流或版本系统中去考察,既有之,由于论述重点并非藩府本,因此也无法将之作为研究的主角给予进一步关注。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学方法、历史学方法、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方法、比较方法。

文献学方法。文献学是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考核、辨证和说明的研究。文献学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现有相关文献资料,通过整理之后进行分析,试图从文献资料中得到新发现。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辨析文字、音韵、训诂,爬梳目录,考订版本,以及校勘、考据、辑佚、辨伪、钩沉等,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证,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澄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文献考证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同时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注重让资料自己说话,戒除浮躁、空虚,力求质朴、简洁、有力。一方面要通过查阅、爬梳大量的原始文献,力求发现新资料;另一方面,力求于常见熟知的文献之中,通过不同的思考角度、不同的资料组合方式以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辨证利用等,发掘“旧”文献的新价值。就本课题而言,

文献学方法是考察明代藩府与藩府刻书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明代诸藩在学术文化上有什么样的成就,影响他们文化学术旨趣和取向的因素有哪些?藩府本有哪些版本特征?在版本目录学意义上有何独到之处?有什么样的文献价值?除版本目录学上的意义之外,明代藩府的刻书活动及其所刻书,又传达出怎样的文化信息?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艰难细致的史料爬梳、资料整理和分析工作,无一不需向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中去挖掘和求证,无一不需借助文献学的考据、校勘、钩沉等研究方法。

历史学方法。历史学方法是考察现象、揭示规律的必要方法,也是文史研究者最常用的方法。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反映历史“经世”和“求真”两大特征,而任何文化现象都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明代藩王们的行为、思想和学术文化成就,同他们当时的社会交接丝丝入扣。藩府刻书在明代的兴盛,也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在分析明代藩府和藩府刻书时,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进行考察,联系当时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艺术、学术思想趋向,才能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例如,史学界认为,宗藩制度最迟当产生于西周初年,而汉、唐时期最为成熟,那么,为什么明代之前并没有出现像明代那样大规模的、具有鲜明“藩府系统性”的藩王刻书活动?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成就了这一别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藩王们除了著述、藏书与刻书,是否还有其他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藩府刻书的内容和特点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政策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此等等,都必须被重置于明代这一特定的时间段里加以考察,力求将其同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宗藩政策演变、文化思想流变以及社会历史变迁结合起来,宏观地、多维地探讨明代藩府与藩府刻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在宏观把握明代藩府及藩府刻书总体规律的同时,结合个案分析,通过纵向脉络的发展过程以及横向的比较研究,尽可能进行切实的分析和恰当的表述。

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方法。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比较常用的方法。以统计方法将搜集的数据系统化,用来说明事物的量的发展。通过对量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对事物的质的认识,这样,把定性研究放在定量的基础上,研究的科学性就增强了。首先要认真搜集数字,分门别类,辨别数字中的真伪,然后进行排列,进行比较、分析、解释,从中得出结论。明代有刻书可考的藩府究竟有多少家?明代藩王们到底刻了多少书?有刻书可考的藩王们占明代所有藩王的比例是多少?藩府本在明代图书生产中又占有多大的比例?什么地方的藩王刻书最多?哪家藩府刻书最多?什么样的书刻得最多?藩府刻书最多的集中在什么时间?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明代藩府和藩府刻书必须要弄清楚的内容。而搞清楚这些数据还仅仅是统计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其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个体因素?各类数据又各自表明了藩府和藩府刻书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等等,通过对“量”的分析,搞清楚这些“质”的内容,是本文运用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方法

的最终目的。

比较方法。本文考察明代藩府和藩府刻书,所用最多的方法就是比较法。比较包括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就“藩府”研究来说,纵向比较,就是将藩府及其刻书活动纵向发展的历史分为不同的阶段,整理出各个阶段之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并将这一纵向发展的过程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体系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此时与彼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变化关系中把握特征和规律,从而展现其历史进程,总结其发展变化的特点,揭示藩府刻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横向比较则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既包括明代藩府刻书同明代整个刻书业之间在时间发展、内容侧重、地域分布等方面的联系和区别,也包括不同藩府之间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志趣爱好,以及同一种书的藩府本同其他版本之间的版本渊源、优劣高下比较等。

需要说明的是,更多时候是要将多种研究方法相互结合。研究对象性质的多重性特征决定了不可能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明代藩府刻书”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的研究客体,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又是出版史、版本目录学史研究的对象。一方面,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这就必须要采用史学方法,而史学本身的研究又离不开对于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因此又无法脱离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藩府本的版本层面的研究,当然更加无法脱离考据、辨伪等文献学手段,无法脱离对于文献资料的爬剔和梳理。另一方面,不同的藩府之间,同一藩府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藩王、甚至同一位藩王前后不同的时期,都有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这些差别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藩王们的刻书活动,也直接导致了藩府刻书从形式风格到内容特点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别的探讨和揭示必然离不开比较方法,而作研究对象差别的比较时,既要对其发展经历、特点进行清理,纵向比较,又需要将不同的藩府和藩府本作彼此之间的横向比较,这些当然要以充实而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 and 统计数据为依据,又离不开文献学方法、史学方法以及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方法。

四、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意义

本课题旨在考察明代藩府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背景,论析历史事实与藩府活动的密切关系,检视明代藩府由武转文的历史趋势,揭示其远政治而近文事的时代特点,深入发掘藩府刻书活动的内在与外在动因,透过现象揭示内在规律,并对有代表性的藩府和藩府本作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由此总结有明一代藩府刻书的版本目录学价值及其在明代出版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揭示明代藩府的特殊社会角色和文化价值。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为明代历史和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视野,为明代藩府研究提供一个更加深入的视角,加强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拓展明藩刻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框架式的立体研究结构,专门、系

统、多维地对明代藩府刻书进行全面考察。一方面从史学角度入手,站在历史发展的层面,将藩府刻书置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审视明代藩王的刻书活动,试图通过表层现象去透视明代藩王大规模刻书的内在原因,总结有明一代藩王刻书的规律;另一方面,以文献钩沉为目的,尽可能搜集明代藩府刻书的相关文献,并通过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使其有序化、条理化,为明代藩府和藩府刻书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疗救现存的“资料缺乏症”,同时也为出版史、图书史等其他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线索,突显本课题的文献资料价值;最后,从版本目录学角度入手,以版本研究为主,针对具体的藩府本进行深度挖掘分析。通过对一定数量的藩府本的个案研究,将之置于版本目录学的学术源流中,利用比较方法,理清来龙去脉,分析其地位和影响,审视明代藩府本的版本学价值,以期给明代藩府刻书的功用和价值做出一个科学恰切的学术评价。如此,则将本课题置于一个以历史学、文献学和版本学为支柱的三位一体的三维研究框架之中,希望借此能够开拓文献学研究的眼界和思路,倘能如此,则是本课题研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其二,突破现有的单线条、平面式研究模式,深入挖掘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往相关研究的普遍特点在于,只对现象和事实进行勾勒式描述,而对于具体问题的考察则显得单向线条化,研究成果过于“平板”,且每一张“平板”之间只是简单的堆积和叠加,缺乏对于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度挖掘。例如,在探究明代藩府大规模刻书的原因时,虽然也进行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但这些考察都是孤立的,而最后的结论也只是罗列一堆藩府本的书目清单,却没有将这些书真正打开,从中找出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留下的影子和印记。本课题试图突破现有的研究思路,既注意考察外部因素对藩府刻书的影响,又注意考察研究对象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形成双向互动式的研究模式,并通过整体梳理、系统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处理手段,使研究对象由扁平而丰满,由平面而立体,从而丰富迄今尚显粗浅化和表象化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

其三,希望能够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为综合利用多种方法研究文献学提供一个成功的实践案例,丰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创新之处。一般的文献学的研究,目光往往局限于文献学领域,所用方法也就难免过于单一,多为考据、校勘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只对藩府刻书的总体情况进行概括和描述,无法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环境中去。本文试图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并希望通过多种手段的相互作用,挖掘出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例如,将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方法用于考察藩府刻书,就会比较清晰地彰显藩府刻书所体现的藩府系统性、时间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这是传统的考据方法无法达到的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突破现有研究视野、研究思路和研究模式,达到深层次、多维化研究明代藩府和藩府刻书的目的。

目 录

序	李致忠(1)
绪 论	(1)

上编 明代藩府刻书总论

第一章 明代宗室分封制度	(3)
第一节 明代诸藩分封的基本情况	(3)
第二节 明代诸藩分封后的基本政策	(9)
第三节 明代分封制度对藩府集团的影响	(21)
第二章 明代诸藩的学术文化成就	(26)
第一节 明代诸藩学术文化活动概述	(26)
第二节 明代藩府著述考	(32)
第三节 明代诸藩藏书概述	(50)
第三章 明代藩府刻书考	(55)
第四章 明代藩府刻书的时间规律	(100)
第一节 明代藩府刻书的时间规律	(100)
第二节 明代藩府刻书时间规律成因考察	(104)
第五章 明代藩府刻书的地域规律	(112)
第一节 明代藩府本地域分布的基本规律	(112)
第二节 明代藩府本地域分布的空间比较	(115)
第三节 明代藩府本地域分布的时间观照	(121)
第六章 明代藩府刻书的内容规律	(126)
第一节 经史为辅	(126)
第二节 子部刻书重点	(132)
第三节 戏曲和小说	(140)
第四节 府系性特征	(144)

下编 明代藩府刻书个案研究

第一章 朱权与宁藩刻书	(149)
第二章 周藩刻书述略	(158)